BIBLID 0254-4466(2011)29:2 pp. 117-151
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2 期（民國 100 年 6 月）

「小說」烏托邦
——論晚清文學的結構性書寫**

顏　健　富*

摘　要

在「揭發伏藏，顯其弊惡」的譴責聲中，晚清小說界掀起另一極端的「希望」之音，形塑出近現代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本文透過大量原始材料，試圖探討看似最基本可是卻棘手的問題：到底，烏托邦之概念與書寫如何在晚清文化界、新小說文體乃至文藝刊物中「發生」？為解決此問題，本文先從「概念旅行」追蹤烏托邦詞彙的翻譯歷程，發現傳教士及中國知識分子因其不同的理念而對烏托邦注入特定的理念與內涵；接著，從「敘事展演」探討晚清作者群於小說敘事中召喚來黃金世界、大同、極樂世界、華胥國等不同來源的概念，拓展出一套「烏托邦家族」，注入救國、冒險、科學等基調，強調主權尊嚴、文明進步等信仰，遙指一個可以逆轉現實困境的新中國，使得理想視域得到（再）創造的契機；第三，從書寫主旨、時空形式與價值內涵歸納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進而爬梳晚清的「文藝脈絡」，考察此時代的結構性視野在文藝場合的發生與表述方式，指出政治、科學、理想、社會小說等次文類投射的烏托邦視野；最後，本文重新評估晚清烏托邦書寫於文學史的位置，指出此遍布各出版社、報章、期刊與作者群的烏托邦書寫，更能呼應「新小說」文體的期待視野，理應受到更大的重視。

關鍵詞：烏托邦、晚清、小說、文學史、新小說

2010 年 9 月 30 日收稿，2011 年 4 月 7 日修訂完成，2011 年 5 月 25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承蒙兩位審查委員提供意見，讓筆者得以調整若干細節與結構，謹致謝忱。

一、前　言

時代沓至紛來的亂象讓晚清作者群發出焦慮、憂傷、憤怒等聲音時，卻也激勵出高亢的救贖渴望，逆反現實，想像中國重振雄風的景象，形塑出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這些作品或是透過未來的「西曆二千零六十二年」（實是二千零二年）舉辦盛大的「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1]或是透過夢境「到馬路上一瞧，不覺大驚，但見世界換了個樣子」，[2]或是寫出海外島嶼的「一隅之地，儼有極樂世界的氣象」，[3]洋洋大觀，此起彼落。於是，原在政治秩序被排擠到邊緣的晚清頓時被虛實交錯的小說敘事編列爲世界中心，「這黃金的亞洲大陸也漸漸發出那極輝煌極絢爛的光芒了」。[4]在救國熱潮中，我們看到天馬行空的敘事，一再違反現實，逆向操作，扭轉乾坤，豎立出位於世界中心的「新中國」，如梁啓超（1873-1929）〈新中國未來記〉創立未來「聯邦共和國」、旅生《癡人說夢記》勾勒海外「鎮仙城」、陳天華（1875-1905）《獅子吼》書寫世外桃源「民權村」、軒轅正裔《瓜分慘禍預言記》想像「新立興華邦共和國」、頤瑣（湯寶榮）《黃繡球》締結可作爲地球範本的「自由村」、吳趼人（1866-1910）《新石頭記》呈現道德與科學完滿的「文明境界」、懷仁《盧梭魂》構築自由獨立的「自由峰」、蔡元培（1868-1940）〈新年夢〉虛擬夢中的「世界主義」、碧荷館主人（楊子元，1871-1919）《新紀元》凸顯國富兵強的新中國、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幻想「世界外之世界」的月球等。從地球到月球、從村到城、從新中國到新未來、從鄉鎮到世界、從島嶼到山峰，看似琳瑯滿目，卻殊途同歸，替摧枯拉朽的中國尋找出路。

以「烏托邦」理論觀之，如此的「歷史位移法」不讓人驚訝，蓋因「烏托邦」具有反面對照的功能，替匱缺的社會寫下美好宣言。從社會機制而

1　梁啓超，〈新中國未來記〉，《新小說》1(1902.11): 1。

2　陸士諤，《新中國》，《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頁 457。

3　碧荷館主人，《黃金世界》，收入王孝廉等主編，《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社，1984），頁 134。

4　東海覺我（徐念慈），〈情天債〉，《女子世界》1(1904.1): 39。

言，西方烏托邦總是反轉黑暗的現實，如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的《烏托邦》（*Utopia*）反轉英國工商業崛起的「羊吃人」的社會、[5]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太陽城》（*The City of the Sun*）對照因衰落貧困、宗教戰爭而湧現大量乞丐、強盜的義大利。[6]因此，「烏托邦」的背景總是跟苦難結合，如金觀濤所言：「烏托邦主義的勃興，必須有兩個社會條件，一個是西方學者常說的現實社會的苦難，另一個是民族文化中原有的社會怎樣才算完美的價值。」[7]考夫曼（Moritz Kaufman）更試圖將此災難與完美的「對照」本質化爲人的內在：人類天生有種美好世界的傾向，所以烏托邦觀念是人類本性的產物，「各種各樣的社會理想，存在於人類心靈的深處……在不同情境中的形形色色的烏托邦模式，清楚地反映了潛藏於一切人心中同樣的理想主義傾向」。[8]

放在「烏托邦」的脈絡下，我們不難理解晚清爲何屢屢出現此類書寫。對於美好世界的渴望與理想主義的傾向，使得時人一再逆轉時代災難，締造可以超越痛苦的美好時空。事實上，學界已有論者將部分晚清小說列爲「烏托邦小說」。[9]其中，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更試圖透過「樂園」與「烏托邦」的差別界定晚清小說不同於文學傳統的「烏托邦」意識。[10]論者先

5 摩爾在《烏托邦》批判貴族侵佔農民的土地，無家可歸的農民被迫流入城市，成爲賣力爲生的無產者：「你們的羊一向是那麼馴服，那麼容易餵飽，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凶蠻，以致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市蹂躪成廢墟。」見莫爾著，戴鎦齡譯，《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21。

6 康帕內拉《太陽城》寫出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初衰頹、貧困、罪惡的義大利：「拿那波利城的七萬居民來說，其中差不多只有一萬至一萬五千人從事勞動；這些人由於逐日從事力所不及的不間斷的工作，而精疲力竭，或瀕於死亡。」見康帕內拉著，陳大維、黎思復、黎廷弼譯，《太陽城》（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 23。

7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2(1990.12): 18。

8 Moritz Kaufmann, *Utopias* (London: Kegan Paul, 1879), p. 122. 轉引自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Philip Allan, 1990), p. 13.

9 論者稱爲「烏托邦小說」，如郭棻，〈論晚清政治烏托邦小說〉，《清末小說》22(1999.12): 53-86；胡全章，〈晚清小說的主題特徵〉，《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4.4(2007.7): 69-72。

10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以「樂園」與「烏托邦」的差別來界定晚清的烏托邦書寫：「樂園」是屬於靜態的，嚮往簡樸的生活，是一個「架構的自足（self-sufficient）而封閉的體系」。反之，烏托邦則是動態，是一個理想與現實交織，美好與醜惡交融的所構造的

後替晚清小說發出「新聲」，可以填補文學史空白，在此基礎上，我們可更進一步開拓與討論問題：到底，晚清人士如何翻譯與解釋「烏托邦」？小說作者如何挪用此一新起的概念？此一問題的研究取徑，顯然得發掘、蒐集、精研大量的原始資料，當中牽涉到「烏托邦」此概念如何翻譯入晚清中國？如何被小說敘事挪用？如何進入文藝脈絡？雖然，晚清的資料非常龐雜，非個人力量所能完成，不過，筆者願以此爲標竿，建構另一階段性任務，且盼能拋磚引玉，喚起學界對於相關材料的更多發掘與探討。

二、概念旅行：「烏托邦」的翻譯

作爲追尋理想社會的文本，各代綿延不絕，使得「烏托邦」有其意義演變的軌跡，不同語境牽涉到特定文化的再現，一旦歷史情景轉化，「烏托邦」的內容或形式便會變化。放到歷史情境中，我們得考量「烏托邦」譯入晚清中國時涉及的翻譯問題。詞義如同一競逐空間，在中西座標上召喚／拒斥、挪用／變革某些質素，裝滿各種方案，參差駁雜，正如薩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所謂的「理論旅行」及隨之而來的意義轉變。[11] 循此，筆者將於本節探討晚清時人因其不同的立場、理念、位置而在翻譯「烏托邦」時出現的表述方式。

一個活潑的園地。她認爲晚清小說首開烏托邦精神，相對於陶淵明式的隱退、超越以及閉關自守的靜態樂園，晚清小說是一幅根植於現世、充滿各種可能變數的動態畫面，小說中「理想中的小世界（microcosm）乃中國此一大世界（macrocosm）的可能縮影；英雄之進駐此小世界，非爲獨善其身，而爲獲得其兼善天下之根據地。晚清小說中之『桃花源』，因此絕非超然入聖。其基本特質，是向外膨脹、向外探求、汲汲於達成現世樂園的理想；其前瞻心態，自也不同於一意緬懷過往的傳統桃花源。」見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中外文學》15.3(1986.8): 89。

11 薩依德以四個階段說明「概念」如何在不同的時空中游動。首先有個起點，標誌某個概念的產生。接著，有一段旅程，一段概念從此至彼地移動時的必經之路，經受各種壓力，面目全新地出現在一個新的時空。然後，移植到另一時空裡的理論和觀念會遇到一些限定性的條件，可稱之爲接受條件。最後，這些充分（或部分）移植過來的（或拼湊起來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被它的新用法，以及它在新的時間和空間中的新位置所改變。見 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26-227.

「烏托邦」一詞創自摩爾於 1516 年發表的專書《烏托邦》（*Utopia*），描繪廢除私有財產與實行平等制度的理想社會。從語源而言，Utopia 此一詞彙從希臘字根的解釋有二：Ou-topos，ou 是「無」的意思，“topos”則爲場所，是世上所無的場所；Eu-thopia，eu 是「美好」之意，是美好的地方。[12] 摩爾透過「一個既美好又子虛烏有的地方」寄寓個人強烈的社會關懷與政治對抗。全書第一部分透過 Raphael Hythloday 批判英國現狀，揭露歐洲社會貧富懸殊的狀況，第二部分則全面勾勒烏托邦的空間視野與具體內涵，如法律、工作、衣著、娛樂等，描繪廢除私有財產後的理想社會，共構成以「苦難」與「美好」的對照框架。

一直要到三百多年以後，「烏托邦」此一概念才正式進入中國。一般認爲，「烏托邦」最早爲嚴復所譯，[13] 可是就筆者掌控的資料，「烏托邦」詞彙的翻譯應比嚴復更早。從晚清傳教士編的「英漢辭典」追溯，已出現「烏托邦」此一詞條。德國傳教士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早於 1866 年至 1869 年之間於香港出版四卷本《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及日本井上哲次郎（1855-1944）於明治 16 年（1883）增修出版的《增訂英華字典》如此說明：「Utopia，n. 幻樂之地，豐樂之地，安樂

12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結合此二語源，做出綜合性的解釋：utopia 暗示著一個既美好又子虛烏有的地方。在希臘語中 eu 相當於 good（好），ou 相當於 not（無），摩爾運用了這種雙關性，utopia 既可以指 eutopia，即一個美好的地方，也可以指 outopia，即子虛烏有的地方，或者可以同時擁有這兩種含義。David Miller,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p.533.

13 舉兩個例子而言，一、史有爲提到：「嚴復是近代第一個大量採用音譯形式介紹外來概念的翻譯家。他用的音譯外來詞和意譯術語有些流行至今。例如第一次在《天演論》中出現的外來詞：烏托邦，理想國，譯自英語 Utopia。至今仍使用。」見史有爲，〈外來詞，科學文化的衝擊與再衝擊〉，《外來詞——異文化的使者》（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頁 238；二、馬西尼提及：「wutuobang 烏托邦，utopia，三音節詞，偏正結構，音譯詞，名詞。始見於 1898 年 Yan Fu (Tianyan lun: 1338)。有些人把該詞看作是描述性新詞。例如，1918 年 3 月 15 日，《新青年》（IV, 3, 267）發表了錢玄同的一封信，錢在信中把『烏托邦』解釋作『烏有寄託』。在回答錢的這一封信，劉（嚴）復說這是一個純音譯詞（同上：281-282）。此詞也寫作『烏有幫』，參閱 Hu Xingzhi (Wailaiyu cidian: 3, 203)。」見馬西尼（Federico Masini），〈十九世紀文獻中的新詞詞表〉，《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頁 251。

國，蓬萊。Utopian，a. 安樂國的，照安樂之國。」[14] 作爲辭典的形式，羅存德顯然考量到閱讀對象與解釋功能，因而透過中國讀者熟悉的概念如蓬萊、幻樂、安樂等詞彙界定 Utopia。以中國固有概念翻譯外來詞的作法普遍出現於晚清文化界，最有名的例子乃是以「格致」翻譯 "Science"。[15] 因此，「烏托邦」一開始傳來中國，便抽離掉摩爾《烏托邦》批判現實及關懷社會的精神，「召喚」出中國的傳統資源，使得「烏托邦」此一概念進入安逸靜態的詮釋空間。此一辭典由於集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以來英漢辭典之大成，備受矚目，發揮影響，如後來發行的《商務書館華英字典》（*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便在 Utopia 的詞條下解釋爲「極樂之地、安樂國」。[16]

相比起傳教士的翻譯策略，中國知識分子翻譯「烏托邦」時融入個人的憂國情懷及救國理念。嚴復於 1894 年演譯《天演論》指出「烏託邦者，猶言無是國也，僅爲涉想所存而已」，[17] 指出此概念的哲理面。1901 年至 1902 年，他翻譯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時，可看出從「僅爲涉想所存而已」的哲理面靠攏向政治面，其中「部丁」篇二指出：「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國俗，望其一日商政之大通，去障塞，捐煩苛，俾民自由而遠近若一，此其虛願殆無異於望吾國之爲烏託邦。」[18] 嚴復在譯文中附加小註更明確指出 *Utopia* 的作者與內容：

> 烏託邦，說部名。明正德十年英相摩而妥瑪所著，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

14 見 Wilhelm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1869)，第 4 冊，頁 1903；Wilhelm Lobscheid 著，井上哲次郎訂增，《增訂英華字典》（東京：藤本次右衛門，明治 16 年（1883）），頁 1148。

15 晚清知識分子習慣用「格致」翻譯西方科學，如利瑪竇、徐光啓、李之藻等人都用過此術語，已經偏離《大學》的「格物」、「致知」。

16 商務印書館編印，《重訂商務書館華英字典》（上海：商務印書館，1913），頁 349。

17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著，嚴復譯，《天演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71），頁 30。

18 亞當．斯密著，嚴復譯，《原富》〈論沮抑外貨不使爭銷之政〉（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卷上，頁 31 左。

> 之隆。烏託邦，島國名，猶言無此國矣。故後人言有甚高之論，而不可施行，難以企至者，皆曰此烏託邦制也。[19]

從上可見，嚴復對於烏托邦的翻譯已相當完備，從西方的烏托邦脈絡切入，凸顯“Thomas More”、“*Utopia*”其人其書與著述年代、學理內涵等。嚴復以「民主之制」、「郅治之隆」詮釋「烏托邦」，已不同於羅存德的「幻樂之地」，反映出其救國位置與追尋「原富」的理念。

從嚴復的個案，可看出 Thomas More 的著作已被晚清知識分子接觸，但是此書甚遲譯入中國。筆者曾於中港臺多地圖書館追蹤，發現最早的中譯本應是劉麟生（1894-1980）翻譯、上海商務出版社出版於 1935 年的《烏託邦》。專門蒐羅與整理民國圖書出版訊息的《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反映同樣的訊息：「《烏託邦》，1935 年 11 月初版，商務印書館，英摩爾（T. More）著，劉麟生譯。」[20] 以此判斷，晚清知識分子早在《烏託邦》譯成中文前便透過其他管道接觸此書，最有可能者是透過日譯本閱得。事實上，經常翻譯西方科幻作品的日本譯者井上勤（1850-1928）早於 1882 年便以日文翻譯此書，可是不採取音譯，取其內容大意，名爲《良政府談》。對於晚清知識分子而言，「井上勤」絕非陌生的名字，他翻譯的科幻或冒險小說大量進入晚清文化界，如《一千零一夜》、《魯濱遜飄流記》、《環遊月球》等。[21]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維新失敗後倉促流亡日本的梁啓超在寫給康有爲的書信——〈與康有爲書〉中論及「大同」學說時，稱英國德麻摩里「著一小說，極瑰偉，弟子譯其名曰《華嚴界》」。[22] 梁啓超信中的「英國德麻摩里」乃是英國 Thomas More（摩爾），《華嚴界》則是《烏托邦》。梁啓超選擇「華嚴界」來翻譯「烏托邦」，並非偶然，反映出時人對於佛教資源的大量利用，[23] 嚴復、馬君武、梁啓超、魯迅等人都曾以「華嚴界」比附西方的「烏

19 同上註。

20 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政治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頁 11。

21 魯迅於日留學期間便曾根據井上勤翻譯自法國小說家凡爾納（Jules Verne, 1828-1905）《月界旅行》的日譯本翻譯成中文，「《月界旅行》原書，爲日本井上勤氏譯本，凡二十八章，例若雜記。」魯迅，〈《月界旅行》辨言〉，《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第 10 卷，頁 152。

22 丁文江、趙豐田，《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175。

23 關於佛教資源的利用，可參見葛兆光，〈晚清對中國傳統資源的重新發現和詮釋〉，《中國

托邦」概念。佛教具有「來世」的承諾，某種程度在缺乏「未來」書寫的文學傳統中，會使時人更易於挑選來表述具有「未來」意識的「烏托邦」。當時人使用「華嚴界」翻譯 Utopia，反映出所譯語言與被譯語言的交鋒，「華嚴界」原本寄寓的「出世」概念卻在翻譯中成爲具有「入世」色彩的「烏托邦」，使得傳統概念捲入「翻譯現代性」的歷程，呈現新義。

就概念翻譯的角度而言，最有系統譯介「烏托邦」的論者並非上述的嚴復、梁啓超等人，卻是較不受今人重視的馬君武（1881-1940），於《譯書彙編》與繼之而起的《政法學報》發表多篇闡述「烏托邦」的文章。出身於廣西桂林的馬君武曾先後赴日本、德國、法國留學，精通日、英、法、德文，翻譯過多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著作。[24] 再觀察馬君武發布文章的場合——「譯書彙編局」，乃是中國留日學生創辦的譯書機構，自 1900 年 12 月於東京刊出《譯書彙編》，1903 年改名爲《政法學報》，主要譯介偏向政治內涵的歐美法政名著，如譯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孟德斯鳩（Montesquieu, 1689-1755）《萬法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等。一旦「烏托邦」進入此富有政治理念的作者與刊物的脈絡，其概念必從原點到接受點的移植過程中受到新的接受條件（如政治學理）的衝擊，進而在新時間和空間中產生新語義。1903 年 3 月，馬君武於《譯書彙編》發表〈社會主義之鼻祖德麻司摩兒之華嚴界觀〉，從題名便可見他有意將摩爾納入「社會主義」的脈絡。[25] 雖然，馬君武仍採取類似梁啓超以「華嚴界」解釋 utopia 的闡釋方法，可是注入個人的社會主義的理念，使得概念經由「旅行」而產生轉調。該文介紹《烏托邦》的時代背景及意義：「距今三百八十四年以前（今年 1903 年），歐羅巴大陸上政治、宗教、社會

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535-543。

24 馬君武翻譯過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自由原理》、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女權篇》、《社會學原理》、盧梭的《民約論》等書。

25 馬君武將摩兒列爲社會主義的系譜，「德麻司摩兒者，實仁慈之社會改良家也，實人群歷史上之社會罪惡大批評家也，實提出新社會之大理想家也。……德麻斯摩兒，實共產主義之開闢大祖師也。彼所處之時，社會改革之思想，尚未萌動而獨首起發機，著不死之偉論，留諸永世」、「前乎摩兒者，有柏拉圖；後乎摩兒者，有法蘭西之社會主義創始者聖西門（Saint Simon）、佛里兒（Fourier），其學說皆最相近。」見馬君武，〈社會主義之鼻祖德麻司摩兒之華嚴界觀〉，《譯書彙編》2.12(1903.3): 115-116。

之腐敗，俱達於絕頂，而破壞改革之機，萌動而不可遏也。英倫乃有一小書出世，此小書者，實爲歐洲改革之原動力。著此書者即德麻司摩兒（Thomas More），而此書之名，即《華嚴界 Utopia》是也。」[26] 內文系統性介紹「烏托邦」的意義：

> 華嚴界者 Utopia，哲人意想中之一虛境也。是虛境者，乃一樂島，遠莫能致。此樂島中，住有完全社會。一切人類，生活快樂，憲法純淨，政府無惡。簡易歡喜，以終其生，無有擾亂險惡一切諸難。此世界眞有此樂島乎？抑無此樂島乎？曰：是不過詩人之遊魂，哲學家之夢想，遇焉遊焉而已。理想高遠之士，寄身塵球，社會之罪惡，政治界之非行，日搆於其目；人民之慘苦無助，呼號哀怨，日接於其耳。或怒或憐，或泣或歌，悲來填膺，無可告語，不得已寄奇想於虛州，托芳情爲誕說。國無人莫我知兮，將以俟諸百世之下也。此德麻司摩兒之華嚴界所以出現，而此世人遂多一種 Utopia 之新學說矣。[27]

此一解說傳達了幾個重要的意涵。首先，他指出烏托邦是詩人之遊魂、哲學家之夢想，把握詞源的「U」topia 的「烏有」意義，勾勒出烏托邦的虛幻特質；其次，「烏托邦」是理想高遠之士因目睹「社會之罪惡」、「政治之非行」、「人民之慘苦」而「不得已寄奇想於虛州」的想像，點出「烏托邦」反轉現實的功能，映照出現實的匱缺；第三，該文精確指出「烏托邦」的精神意義與幸福觀，民衆生活快樂、憲法純淨、政府無惡。此足以說明馬君武對於「烏托邦」的精確掌控，不再是翻譯者籠統的詮釋，而是能深入到學說特質、內容與精神。

馬君武的學說經常中西雜用，使得華嚴界、極樂世界等來自不同脈絡的概念都可用來指涉注入「社會主義」的「烏托邦」。1903 年 4 月，就在〈社會主義之鼻祖德麻司摩兒之華嚴界觀〉發表的隔月，馬君武於取代《譯書彙編》的《政法學報》第 1 期發表〈社會黨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亞旅行》〉，介紹法國社會主義者加菩提（Etienne Cabet, 1788-1856），將加菩提的著作 *Voyage to Icaria* 與摩爾的 *Utopia* 並列爲「改造社會之新模範」。他在文章結尾處加了一個「按」，標誌出中西的理想視域的差別：

---

26 同上註，頁 110。

27 同上註，頁 109。

> 《列子》之華胥國，陶淵明之桃花源，皆與此等學說最相近。然泰西既立一言，則必求其能實行於世。前死後繼，故能建立社會主義，而握今世莫大之權力。列陶之徒，放言自恣，而無實行其主義之心，故世人亦止以遊戲文章讀之而已。此則誠可嘆也。[28]

馬君武將文學、思想界的各派學說並列比較，指出各學說的差異在於「實踐性」，列子「華胥」、陶淵明（約 365-427）「桃花源」不具實踐性，止於「遊戲文章」，可是「社會主義」卻能付諸行動，具有改造社會的功能。當然，此種區別源於馬君武個人的價值判斷，列陶與社會主義的區別與其說是遊戲與行動的區分，倒不如說是其學說內涵的差異。

大體而言，發展至馬君武，「烏托邦」詞彙已從簡單的翻譯進入學說論述的脈絡，反映出論者對此概念的掌控，更能闡發其源起背景與學說脈絡。若我們追蹤到清朝結束的 1911 年，隸屬晚清「江蘇常熟人」文藝圈、《小說林》編輯的黃人（字摩西，1866-1913）[29] 所編的《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如此解釋「烏托邦」：

> 烏托邦：理想上假設之國，無所在之意。其國政治上、社會上，一切調度，無不完備。多麥司．摩亞所作寓意小說中，所載普通選舉之共和國，爲一夫一婦、信仰自由、禁止貨幣等之一社會。[30]

同屬工具書範疇，比起數十年前傅教士《英華字典》的翻譯，此《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對於「烏托邦」詞彙的翻譯與解釋已臻成熟，精確指出詞彙的核心概念、來源與學說內涵，凸顯其對政治與社會的強烈關懷，已非昔日的蓬萊、安樂國等更偏向隱退封閉的靜態空間的詮釋。從羅存德的辭典到黃摩西的百科全書，「烏托邦」概念之形成並非一蹴而就，卻是經歷連串的表述策略的轉變，成就了一套經由「旅行」的「烏托邦」概念，經由中西概念的挪用與拒斥，交錯／混淆／重疊出一套理想圖像，展現出處於世紀之交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批判與社會期許。

---

28 馬君武，〈社會黨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亞旅行》〉，《政法學報》1(1903.4): 80-81。

29 關於黃人的生平與著述，可見王永建，《「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一書。

30 黃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午集〉（上海：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頁 35。

三、敘事展演：「小說」烏托邦

如前所述，「烏托邦」受到歷史語境的制約／開拓，因而，正值各種新舊知識與理念競逐的晚清必然投射出一套屬於其語境的理想社會，有別於《詩經》〈魏風〉「樂土」、《老子》「小國寡民」、《莊子》〈馬蹄〉「至德之世」、《列子》〈黃帝〉「華胥國」、陶淵明〈桃花源記并詩〉「桃花源」等更訴諸簡樸生活或「架構的自足（self-sufficient）而封閉的體系」，開拓出「根植於現世、充滿各種可能變數的動態畫面」。[31] 筆者欲回到一更接近起源的問題：到底，晚清作者如何透過「烏托邦」此一後起的概念表述新理想視野？小說敘事又如何演繹此一逸出文學傳統的概念？

若根據題名，二十世紀前似乎尚未有以「烏托邦」爲題名的小說，[32] 一直到 1906 年才出現蕭然鬱生刊登於《月月小說》第 1、2 號的〈烏託邦游記〉與 1909 年至 1910 年悲盦連載於《砭群叢報》的〈烏託邦之豪傑〉。這兩篇以「烏託邦」爲題名的小說反映了「烏托邦」自羅存德十九世紀 70 年代辭典翻譯、90 年代嚴復等人譯介到 1906 年正式成爲小說題名，前後涉及數十年的傳播時間。阿英（錢德富，1900-1978）於 30、40 年代著錄的《晚清戲曲小說目》實已羅列此兩篇小說的篇目：

> 烏托邦游記　蕭然鬱生著。光緒三十二年（1906）《月月小說》本。不完。
>
> 烏托邦之豪傑　悲盦著。宣統元年（1909）《砭群叢報》本。不完。[33]

此以「烏托邦」命名的小說實可讓後人更具體而微地檢視晚清小說作者對於「烏托邦」概念的想像。雖然，蕭然鬱生與悲盦的身分不明，不過，其留存的小說敘事卻能讓我們窺探、推敲時人的「烏托邦」視野。1906 年，蕭然鬱

31　張惠娟，〈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中外文學》15.3(1986.8): 80-81。

32　晚清文藝期刊、工具書（如《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五百種明清小說博覽》、《民國時期總書目（1911-1949）》、《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彙錄》等），皆不見十九世紀以前有以「烏托邦」爲題名的小說。

33　阿英，《晚清戲曲小說目》，收入柯靈主編，《阿英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 6，頁 155。

生於剛發刊的《月月小說》第 1、2 號連載〈烏託邦游記〉，由敘事者勾勒出「烏托邦」概念的「旅行路線」：

> 偶然看見英國一個名士做的一部書，說英國人佗麻斯摩爾有烏託邦一本小說，裡邊說烏託邦這樣那樣。又看見英國名士赫胥黎的天演論，也提起「烏託邦」三字。[34]

敘事者提及透過「英國名士赫胥黎的天演論」看到「烏託邦」三字，正是本文前述的嚴復翻譯赫胥黎《天演論》版時提到的「烏託邦」。小說敘事固然無法等同於事實，但是其勾勒的「旅行路線」，多少反映出時人透過《天演論》觸及「烏托邦」的概況。從小說著於 1906 年的時間，或可推敲「烏托邦」概念進入中國的傳播路線：先從十九世紀末傳教士的辭典比附，進入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思想界的挪用，進而轉化到小說敘事的展演。

〈烏託邦游記〉充分展現出「烏托邦」的「烏有」概念：「一個地球上通不去的地方，地圖上也沒上著這個地名、著著一點顏色。地理書裡也沒說著這個地方的情形同內容。世界上的人，也從來沒有曉得這個地方，卻被我游了轉來，記了出來。」[35] 此一連串的「沒」把握住了 Ou-topos 的希臘文語源，ou 是「無」的意思，topos 則爲場所，合而觀之，意味著世上所無的場所。我們可從幾個線索觀察作者的烏托邦想像如何逸出文學傳統？以烏托邦門檻而言，〈烏託邦游記〉強調「不曉得盡心竭力光復祖國，只知游蕩」的亡國人民「想到烏託邦去麼？恐怕烏託邦裡，不配你這種人游歷」。[36] 小說傳達門檻的訊息：只有「盡心竭力，振興祖國」者方可進入，「老大帝國的人民」則無法入關。在晚清時人的政治焦慮與改革期許中，入關者的身分已逸出史傳所強調的方士、陶淵明「桃花源」強調的漁人或魏晉唐代仙鄉強調的凡夫俗子等；[37] 從烏托邦的價值內涵而言，〈烏託邦游記〉逸出文學傳統的靜態簡樸、完美自樂，尊崇發揚「進化」論，於是作者安排敘事者閱讀老和尚「亡漢遺

34 蕭然鬱生，〈烏託邦游記〉，《月月小說》1(1906.11): 3。

35 同上註，頁 2。

36 同上註，頁 6。

37 王孝廉與李豐楙曾對闖入仙鄉的方士、樵夫、漁夫等身分作出分析，見王孝廉，〈試論中國仙鄉傳說的一些問題〉，《文史學報》12(1982.6): 50；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頁 16-23。

民」（烏有生）藏於寺院「空谷傳聲」的三本《烏託邦游記》，分別記述「腐敗時代」、「過渡時代」與「維新時代」，呼應康有爲「據亂世」、「升平世」到「太平世」的進化觀。不過，有完美預設的「烏托邦」如何與腐敗、過渡聯繫呢？詞義的破綻與其說是作者對於概念的模糊，倒不如說是其改革之志超越概念的約束，迫不及待地透過目地（烏托邦）完成從「腐敗」、「過渡」到「維新」的過程。

同是未完刊小說，跟〈烏託邦游記〉不同的是：悲盦的〈烏託邦之豪傑〉百年來一直未受評論。《砭群叢報》的流傳度不似《月月小說》，保存甚罕，一般論者不易發現。悲盦身爲《砭群叢報》的唯一編輯，兼具編寫身分，乃是刊物的靈魂人物，在創刊號即負責寫刊物序言與多篇文章。其中「說部」刊出他的兩篇小說：〈中國穡者傳〉與〈烏託邦之豪傑〉，就置於刊物卷首的〈發凡〉篇多少可見出其創作初衷：「一曰中國穡者傳，則誘掖農業之進步，一曰烏託邦之豪傑，則我中國散家財爲公益之奇士。……取其善可以勸而惡可以戒者，或足爲社會之借鑑焉。」[38] 此介紹自己小說的言論，恰好勾勒出烏托邦書寫的功能價值：公益奇士、勸善懲惡、社會借鑑等，反映入世的精神。就小說的表達技法而言，悲盦選擇了一個晚清新小說經常出現的「故事新編」的方式，[39] 在傳統仙鄉的「故」事上注入晚清價值，逸出避世、壽命、安樂等傳統命題，更強調冒險、開荒、發展等，締結出新的理想視域。小說描寫公益奇士因中國人口衆多而引發資源有限的危機，於是帶領衆人出海開拓資源，尋得當年徐福的「仙鄉」遺址。故宮壁上殘留秦文，寫著「大神徐福承天帝命下治人間，將六甲神兵、金童玉女三千衆暨樹藝百工之事，得平原廣澤於三神山之間，縱橫千里……」[40] 顯然，作者無意於發揚傳統仙鄉，放大兩代人的價值差序，達成我輩克服前輩的教誨：徐福等人因迷信島上有凶兆而離開，可是破除迷信的晚清人卻爲開墾而留下，四處探勘，盼能解決國家危機。帶著入世精神的晚清人物經由克服與超越的結構，開拓

38 悲盦，〈發凡〉，《砭群叢報》1(1909.5): 9-10。

39 「故事新編」取自魯迅，按照魯迅意涵：「故事新編」乃是取材於神話、傳說、寓言、歷史，「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魯迅，〈《故事新編》序言〉，《魯迅全集》第 2 卷，頁 342。

40 悲盦，〈烏託邦之豪傑〉，《砭群叢報》3(1909.6): 35。

出不同於「仙鄉」的「烏托邦」版本，宣告文學傳統中的理想空間的轉向。

從文藝發展而言，蕭然鬱生於《月月小說》發表〈烏託邦游記〉後，Thomas More 與 *Utopia* 一再進入時人的敘事、評論與翻譯。1907 年 1 月，蠻（黃人）發表於《小說林》創刊號的〈小說小話〉便以「烏托邦」形容《水滸傳》的組織：「水滸一書，純是社會主義。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謂至矣。自有歷史以來，未有以百餘人組織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資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獨立之才幹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幾於烏託邦矣。」[41] 黃人是晚清重要的評論者，其連載於《小說林》的〈小說小話〉開拓與反思各種文藝觀點，如小說與社會的關係、文學創作的規律等。此以「烏托邦」詮釋《水滸傳》的梁山泊組織，正反映時人援引西方思潮重讀中國傳統名著的新視角；1908 年 3 月 11 日，署名「譯東報」、刊登於《申報》的翻譯作品〈新理想國〉於序言中介紹摩爾及其著作：「新理想國者，一千七百年間，英國學士名麼阿者所作也。」[42] 所謂「麼阿」實指 Thomas More，不過譯者報錯年代，將「一千五百年間」記成「一千七百年間」。此譯文接著透過各種比附的方式介紹摩爾的「烏托邦」：因當時民困，政令暴虐，因此「人人心意中」常懷有「極樂國之思想」，「而此理想國者，適於其時出版」，合於英人心理，因此受到時人稱頌，「其後，理想國之名詞或稱爲黃金世界，或稱爲縹□鄉。解其字義，則希臘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43]

〈新理想國〉中西混雜的詞彙概念預告了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家族」——將各種具有理想意涵的名稱並列，融入晚清新價值，使得各種原本屬於不同脈絡的名稱產生轉調。就晚清的文藝材料中，最爲淋漓盡致演繹「烏托邦」概念與「烏托邦家族」的作者可能出乎學界的意料，並非更爲論者注意的梁啓超〈新中國未來記〉、吳趼人（1866-1910）《新石頭記》或陸士諤（1878-1944）《新中國》，卻是來自江蘇武進（今常州）、帶有舊式文人身分的許指嚴（1875-1923）。從許指嚴使用的別名如硯耕廬主、彈華閣主、硯耕廬、受汶汶軒等，[44] 及其往後流傳的史料筆記、掌故密文如《十葉野文》、

41 蠻，〈小說小話〉，《小說林》1(1907.2): 4。

42 譯東報，〈新理想國〉，《申報》1908.3.11，第 2 張第 4 版。

43 同上註。□乃是字跡不清，似「簿」字。

44 關於許指嚴的名號、生平，見嚴芙孫，〈民國舊派小說名家小史〉，收入魏紹昌編，《鴛

《清鑒易知錄》、《清史野聞》、《天京秘錄》、《京塵聞見錄》等多描寫官場陰謀、朝廷黑幕、太監爭鬥等，不難窺出其舊式文人的品味。可是，晚清的烏托邦書寫乃由一套中西交會的知識框架所支撐，顯然需要更強烈的新學企圖與視野，許指嚴的舊式文化身分看似跟此書寫風馬牛不相及。不過，1909 年，許指嚴以「高陽氏不才子」的筆名寫出〈電世界〉，刊登於《小說時報》創刊號，將「烏托邦」概念的演繹與想像發揮到極點，以「類百科全書」的駁雜知識，巧妙以「電學」爲主軸，擴充而出，讓電學在社會、教育、政治、交通等領域發揮功效，企圖締結完美的電學世界，堪稱爲晚清「烏托邦」的代表。

更深入觀察，許指嚴造成的歷史「弔詭」，恰好牽涉到其處於晚清「新小說」書寫的末端與其個人書寫生涯的開端的重疊而不得不然的趨勢。許指嚴的創作生涯稍晚於梁啓超、吳趼人、陸士諤等人，其〈電世界〉發表於宣統元年實已是晚清末端，「新小說」創作隨著政治進程而走向強弩之末，四大小說刊物——《新小說》、《繡像小說》、《小說林》、《月月小說》隨著《月月小說》於 1909 年的停刊而偃旗息鼓，進入舊式小說即將復辟的年代。作爲許指嚴的「出師記」的小說——〈電世界〉強烈地回應了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呼聲，將語體／文體／國體的改革置於一體，且援引大量於晚清方興未艾的新知，可視爲清末書寫的「回光返照」。隨後，新小說創作隨著政治演進而逐漸式微，不少鼓吹新文化的有志之士亦多步入舊文化陣營，許指嚴拋棄了〈電世界〉的書寫策略，進入舊文體、語體的著述。若從晚清新小說的末端與許指嚴個人書寫生命的開端的重疊而造成的弔詭切入，其創作的〈電世界〉又帶著傳奇式的迷魅，上演了現實朝廷的國運滅亡與敘事想像的鴻業延展的弔詭。著於宣統元年的〈電世界〉，將時間延伸到未來的宣統 101 年到宣統 302 年之間的兩百年，即是從 2010 到 2210 年。反諷的是：此遙想宣統百年盛世的小說卻於兩年後隨著清朝的覆滅而壽終正寢，歷史的演進無疑提前否決〈電世界〉的敘事想像。可是，更具戲劇張力的是：許指嚴的宣統未來夢

鴛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頁 467；鄭逸梅，〈南社社友事略〉、〈南社社友齋名表〉，均收入《南社叢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128-129、658。

卻經由百年的歷史與政治的演進而復活，〈電世界〉安排的 2010 年電學博覽會時程表竟然準確無誤地落實於如火如荼舉辦於上海的世博會，錯綜而複雜地激盪出現實與歷史、小說與時代的對話，且交錯於許指嚴個人與時代「開始／結束」的書寫隱喻中。

或許此只是歷史的因緣際會！更需指出的是：許指嚴透過〈電世界〉的未來狂想記衝擊了文學傳統的理想視域，將大道已消失的悼古姿態變成「進化論」教條下的瞻仰未來，展現出一組結合了中西脈絡的「烏托邦家族」。小說一開始寫敘事者正從「華胥國」遊歷返回，途經上海，「剛巧舉行上海新都百年紀念，熱鬧得人山人海，徹夜笙歌，眞正是黃金世界。」敘事者接著翻閱「宣統一百零一年」的《華夏新聞》，得知「亞細亞洲中央崑崙山脈結集地方，有名烏託邦者，新出一位電學大家」，[45] 倡議要以電力改變世界，成爲電帝國。接著，小說出現晚清作者群常犯的敘事錯亂的問題，從第一人稱轉向全知視野，敘述電學大王「改變世界」的過程。作者透過各種中西混合的概念投射出一個趨向完美的世界，如第 6 回解決貧富不均的社會現象，「大同世界……財產愈富，物價卻愈低廉」，因此「物價不致過高過低，人民便也沒有極貧極富，豈非眞正大同世界、至治極樂嗎？」國家財庫的金錢多得數不清，「黃金世界，湧現筆端。」第 8 回寫修繕馬路、廣設電燈電椅，「這不算得極樂世界麼？」第 10 回寫電機採打田稻的便利與清潔，且使得落葉枝梗經由腐敗後變成肥料，「大同世界時代地方的清潔，好說從古以來沒有的」；[46] 此透過中西座標召喚來的黃金世界、大同世界、極樂世界、華胥國、崑崙等空間概念，固然有其不同的脈絡，卻共同指涉向完美的社會國家，形塑出晚清的「烏托邦家族」。

由上可見，「烏托邦」作爲新的理想空間的表述，使得晚清作者群重構出一套不同於文學傳統的視野。如果說仙鄉桃源透過避世、壽命、安樂等命題強調靜態簡樸、完美自樂的價值，那麼，晚清作者群則是透過政治、冒險、科學等類型凸顯主權尊嚴、文明進步的信仰。時人借鑑各種中西交會的政治論述、科學發明與知識思潮，集合佛家、道家、儒家、民族國家、社會主

45 許指嚴，〈電世界〉，《小說時報》1(1909.9): 1。

46 同上註，頁 22、30、37。

義、科學主義等不同脈絡的概念，注入未來、探險、科幻、進化論等元素，遙指一個可以逆轉現實困境的新中國，使得理想視域得到（再）創造的契機。[47]

四、文藝脈絡：烏托邦視野的發生

誠如前述，當「烏托邦」概念進入晚清小說的書寫場合時，結合晚清的歷史背景與時代理念，重構出一套不同於文學傳統的新理想視野。筆者將於本節透過文類角度爬梳晚清的文藝脈絡，考掘與追蹤此涉及一個時代的結構性視野如何發生、表述與競逐？「文類」反映觀念上的模範（conceptual model），在「小說」此一大文體類別下，可依不同題材而分出諸多「次文類」（subgenre），如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教育小說、科幻小說等。論者已指出晚清文藝界的小說分類多是紛雜紊亂，經常出現按題材、體製、敘事等相互混淆的情形。[48] 無論其分類多蕪雜，卻始終未見「烏托邦小說」的次分類，可見「烏托邦」雖已作爲概念與題名進入晚清文藝界及新小說創作，可是尚未成熟到如西方「烏托邦文學」的次文類劃分。[49] 當「烏托邦」文類無法作爲一追蹤的標竿，我們或可逆向思考：具有烏托邦視野的書寫如何出現於晚清文藝刊物？受到怎樣的劃分？

---

47 論者多已指出晚清小說作者因借鑑西方思潮與書寫模式而改寫文學傳統的理想空間，如黃錦珠指出：西洋小說的未來時空使得「中國小說的想像空間由此拓展了，未來時空與科技的描繪，取代神魔鬼狐以及與世無爭的桃花源世界，成爲此時想像馳騁的主要題材。」王德威指出：晚清小說作者除受傳統中國烏托邦原型的啓發，「儒勒．凡爾納的探險小說和赫伯特．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派文論，都使中國的文人深受啓發，而晚清雜誌裡也連載過大量的西方科幻小說。」見：黃錦珠，〈創作活動中小說觀念之轉變〉，《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 372；王德威著，宋偉傑譯，〈淆亂的視野——科幻奇談〉，《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 348。

48 陳平原，〈「新小說」類型理論〉，《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64-175。

49 關於西方烏托邦文學的評論可見喬．奧．赫茨勒（Joyce Oramel Hertzler）著，張兆麟等譯，《烏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等著作。

本文前兩節對「烏托邦」概念的考掘與分析，恰能作爲歸納晚清「烏托邦視野」的參照。從書寫主旨而言，無論是出現於梁啓超、嚴復、馬君武等人論述或是〈烏託邦游記〉、〈烏托邦豪傑〉、〈電世界〉等小說的「烏托邦」概念，皆以「拯救中國」爲主旨，設法替摧枯拉朽的中國指陳出路，具有反轉現實的功能，一體兩面地投射出作者的政治焦慮與改革欲望；第二，從時空形式而言，這些反轉現實的新理想時空或如〈烏託邦游記〉與〈烏託邦之豪傑〉採取類似文學傳統的「他方」（空間），或如〈電世界〉借鑑西方、日本的「未來記」書寫以「未來」（時間），作爲跨越現實的方式。需指出的是：看似跟傳統有所呼應的「他方」有所轉向，從虛幻的海外島嶼轉到晚清新歷史地理學脈絡下的世界經緯或世界外的世界，展現新空間觀；第三，從價值內涵而言，晚清作者群相當程度地替烏托邦視野注入現代化的政治體制、科學技術、社會福利、文化教育、經濟體制等元素，改變傳統無爲逍遙、儉樸歸眞的精神，重製且承載了一個時代有關的世界、科學、哲學、文學等綜合價值的理想視野。

以此線索追蹤，我們可發現諸多未必使用「烏托邦」詞彙的晚清小說卻於敘事中勾勒出「烏托邦視野」，反映此一書寫並非侷限於少數。我們若全盤性檢閱晚清新小說，可發現烏托邦視野廣泛出現於各文藝陣營的刊物，最早的一篇應是 1902 年梁啓超發表於《新小說》第 1 期的〈新中國未來記〉，正是「新小說」此一文體發軔的起點。追及《新小說》創刊前的廣告文，可發現只寫五回合的〈新中國未來記〉的刊登並非偶然，而是經過縝密策劃、設計與宣傳。1902 年，梁啓超以「新小說社」名義於自己編的另一份報刊《新民叢報》發布廣告〈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宣傳《新小說》及即將刊登的小說，並且引介域外書寫與闡釋理想、歷史、政治等各種小說類型。與其說此「廣告」是廣告，倒不如說是一篇洋洋灑灑的文藝論述，更偏向晚清文藝刊物常出現的「小說叢論」。[50] 該文對於「政治小說」與「哲理科學小說」的介紹，預告了晚清新小說的「烏托邦」視野，如「政治小說」底下寫著：「政治小說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論皆以中國

50 如《新小說》固定刊出的〈小說叢話〉、《小說林》固定刊出的〈小說小話〉等，漫談小說原理、文藝功能與文學藝術等觀念。

爲主，事實全由於幻想」，並列出他有意創作的小說：「《新中國未來記》、《舊中國未來記》《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國》）。」[51]「哲理科學小說」一欄底下寫著：「專借小說以發明哲學及格致學，其取材皆出於譯本」，並列出各種具有烏托邦視野的譯本：「《共和國》希臘大哲柏拉圖著、《華嚴界》英國德麻摩里著、《新社會》日本矢野文雄著、《世界未來記》法國埃留著、《月世界一周》、《海底旅行》」。[52]

上述列於「政治小說」、「哲理科學小說」的條文範本，如梁啓超計畫寫的〈新中國未來記〉與〈新桃源〉、英國德麻摩里（摩爾）的《華嚴界》（《烏托邦》）、日本矢野文雄的《新社會》等，反映出有異於中國傳統的理想視野，繪製出一套由科學、政治、社會、教育、經濟等知識承載的新世界。其中，「其立論皆以中國爲主，事實全由於幻想」反映晚清烏托邦視野的書寫主旨與時空形式，「專借小說以發明哲學及格致學」則凸顯以現代思潮爲基調的價值內涵。當時流亡於日本的梁啓超透過仿明治小說的方式將政治理念投射到「未來記」書寫，[53]使得〈新中國未來記〉開端出現了猶如末廣鐵腸（1849-1896）《雪中梅》「發端」的國會一百五十週年慶典[54]的「維新後五十年大祝典」：

> 話表孔子降生後二千五百一十三年（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即西曆二千零六十二年（今年二千零二年），歲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係我中國全國人民舉行維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55]

從引文可見，梁啓超透過一系列的時間標誌，彰顯盛世的蒞臨，勾勒出中國

51 新小說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14(1902.8): 無頁碼。

52 同上註。

53 關於梁啓超與日本明治小說的關係，可見夏曉虹，〈梁啓超與日本明治小說〉，《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53-87。文中「《新中國未來記》溯源」一節指出：明治年間的作者熱中於幻想未來社會，「未來記」成爲政治小說的一種常見形式。梁啓超的小說取名爲《新中國未來記》，乃是綜合《新日本》與《二十三年未來記》一類的書名。

54 關於〈新中國未來記〉與末廣鐵腸《雪中梅》的關係，可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時間的轉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 38。夏曉虹，〈梁啓超與日本明治小說〉，頁 83-84。

55 梁啓超，〈新中國未來記〉，《新小說》1(1902.11): 1。

在「未來」的時間點變爲「聯邦大共和國」的敘事。作者以歷史位移法逆轉強弱，製造出四方各國向中國靠攏的宏觀場景，宣告因政治改革而成功佔據世界中心的「新中國」，「舉國之民，戮力一心，從事於殖產興業，文學之盛，國力之強，冠絕全球。」[56]

作爲小說界革命與新小說創作先鋒的《新小說》無疑具有示範作用。從 1902 年的〈新中國未來記〉掀開想像「新中國未來記」的序幕後，相關作品相繼湧現，如往後陳天華（1875-1905）刊登於《民報》的《獅子吼》、春颿刊登於《月月小說》的《未來世界》皆被劃分到「政治小說」，其「立論皆以中國爲主」毫不保留，一再以盛世慶典製造「新中國未來記」的想像。《獅子吼》讓敘事者經由夢境見證「恐怕倫敦、巴黎也沒有這樣」的「光復五十週年紀念會」，[57]《未來世界》則是安排「三百年老大帝國，忽成獨立之邦；四百兆黃種同胞，共進文明之域。」[58] 這些小說表現出「拯救中國」的書寫主旨、強調現代文明與政治主權的價值內涵、採取「未來」時間的文學形式，展現出晚清的烏托邦視野。於此書寫中，我們可見不同的政治理念的角逐，或漸進的「改良」或激進的「革命」，其政治情結愈沈重，其邏輯思考愈簡單：中國的成敗往往歸於相關理念的實踐與否，如《未來世界》批判革命，將「新中國」歸功於改良立憲；《獅子吼》卻批判「立憲」，將未來歸功於「革命」。「政治」成爲晚清烏托邦視野的核心，正好切中時勢，讓時人「以稗官之異才，寫政界之大勢」，[59] 夾議夾敘，替風雨飄搖的中國尋找出路。

當「政治」成爲晚清的烏托邦視野的核心價值時，「科學」亦不落人後，頻頻出現，成爲拯救中國的核心內涵。相對於政治小說，科學小說更凸顯其作爲對造現實的時空形式，擴大「他方／未來」的可能性，甚至促成「世界外之世界」的敘事。科學想像替晚清的烏托邦視野注入聲光化電的參照資源，或可借用徐念慈於《小說林》創刊號的〈小說林緣起〉之語：「月球之環遊，世界之末日，地心地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學之理想，超載自然

56 同上註。

57 陳天華，《獅子吼》，《晚清小說大系》，頁 4。

58 春颿，《未來世界》，《晚清小說大系》，頁 131。

59 梁啓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100(1901.12): 6。

而促其進化者也。」[60] 科學視角固然使得作者得以將理想視域推到「世界外之世界」，可是又因其「超載自然而促其進化者」的訴求而非止於天馬行空的幻想，形塑出有別於傳統蓬萊仙境、冥界天界的星球宇宙，反映出晚清時人對於科學文明的價值投射。荒江釣叟 1904 年刊載於《繡像小說》第 21 號至 62 號的《月球殖民地小說》標上「科學小說」，融入西方的科幻想像，安排角色龍孟華於日本友人玉太郎的協助下，乘著汽球騰空飛行，尋找因受朝廷迫害而失散的妻子，將「他方」投射到地球外的「月球」，藉由「月球」的文明進步對照人世的污穢滯後。1908 年，碧荷館主人於上海小說林社出版的《新紀元》以議論的方式說明「科學」的價值：

> 未來世界中一定要發達到極點的，乃是科學，所以就借這科學，做了這部小說的材料。看官，要曉得編小說的，並不是科學的專家，這部小說也不是科學講義。雖然，就表面上看去，是個科學小說，於立言的宗旨，看官看了這部書，自然明白。[61]

藉著引文脈絡，可見「科學」作爲晚清烏托邦視野的一大價值訴求，可是，「科學小說」不同於「科學講義」的格致啓蒙，另有作者刻意不明說的「立言主旨」。就全書的表現，小說主人翁以科學發明海戰知覺器、洋面探險器、洞九淵等設備排除水雷等，以中國「化水爲火」的科學秘法擊退西方的綠氣炮，最終透過「他方／未來」的時空形式成就中國的「新紀元」，向西方索取高額賠償、享有國外租界權。碧荷館主人不願直言的「立言主旨」不辯自明，正是「拯救中國」的呼聲，中國遭遇的各種不堪都於想像的時空中得到反轉。

從邏輯推論，讓晚清知識分子趨之若鶩的「德先生」與「賽先生」會成爲晚清新小說烏托邦視野的主要支撐，可是就實際追蹤，列入「政治小說」與「科學小說」的數量不如其他次文類。此一現象反映出文類的競逐，使得相關小說被吸納到其他類別。以 1906 至 1908 年《月月小說》出現的徵文廣告爲例，編者多次鼓吹「理想小說」的類型，如「本報注重教育，凡有關於

60 覺我，〈小說林緣起〉，《小說林》1(1907.2): 4。

61 碧荷館主人，《新紀元》，《中國近代孤本小說精本大系》（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頁 458。

科學、理想、哲理、教育，若有佳本寄交本社者，已經入選，潤資從豐。」[62]「理想」比起「政治」、「科學」有更大的涵蓋性，上述的政治、科學類型皆可歸入其中，如 1906 年蕭然鬱生刊登於《月月小說》的〈烏託邦游記〉、1909 年許指嚴刊登於《小說時報》的〈電世界〉、1910 年陸士諤由改良小說社出版的《新中國》等，都歸於其中。理想小說所具有的涵蓋性甚至將原本列於其他次文類的小說吸納過來，如俠民 1904 年連載於《新新小說》第 1、2 期的《中國興亡夢》列入「政治小說」，隨後斷刊兩期，第 5 期刊載時已從「政治小說」的欄目轉到「理想之俠客談」，[63] 反映出次文類的遊移。理想小說的吸納性，說明晚清作者群拓展出愈來愈恢弘的烏托邦視野，超越單一的科學或政治訴求。最明顯的例子是：收於此類別的〈電世界〉與《新中國》結合政治、科學、教育、文化、社會、醫療、史地學等，於「他方／未來」的想像時空中締造中國盛世，繪製出全方位的烏托邦視野。即或如此，時人仍覺得「理想」有所不足，如 1908 年，吳趼人替刊登於《月月小說》第 13 號的〈光緒萬年〉標上「理想科學寓言譏諷詼諧小說」，[64] 又於 1910 年替《最近社會齷齪史》作序時爲兩年前由上海改良小說社出版的《新石頭記》作補述：「兼理想、科學、社會、政治而有之者，則爲《新石頭記》」，[65] 投射出晚清烏托邦視野的複合性內涵。

作爲晚清救國核心價值的「政治」、「科學」及具普遍性的「理想」類型成爲「烏托邦」視野作品的大本營，並不讓人意外。弔詭的是：有一看似偏近「寫實」的類型——「社會小說」卻產生更大的吸納力，如 1905 年刊登於《南方報》的《新石頭記》（吳趼人著）、《繡像小說》的《黃繡球》（陋瑣著）、光緒刊鉛印本的《盧梭魂》（懷仁著）、1908 年刊登於《月月小說》的〈新舞臺鴻雪記〉（報癖著）、1909 年由改良小說社出版的《新三國》（陸士諤著）等，皆列入其中。我們或可從時人的解釋找到蛛絲馬跡。刊登於《小說林》的〈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如此解釋「社會小說」：「有種種現象，

62 月月小說編輯部，〈本社徵文廣告〉，《月月小說》1(1906.11): 無頁碼。

63 新新小說社，〈新新小說第五期目錄〉，《新新小說》5(1905.2): 目錄頁。

64 我佛山人，〈光緒萬年〉，《月月小說》13(1908.2): 1。

65 吳趼人，〈《最近社會齷齪史》序〉，收入《吳趼人全集》（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第 3 卷，頁 299-300。

成色色世界，具大魔力，超無上乘。」[66] 此一從佛家用語轉渡的詞彙凸顯「改革」的功能：「社會小說」反映出「種種現象」、「色色世界」，恰可作爲針砭的對象，造就「超無上乘」的改革「魔力」。於是，「社會小說」潛藏的改革後的視野易於跟烏托邦的時空形式（他方／未來）接軌，而其改革方案又符合烏托邦訴求的價值內涵。《盧梭魂》寫各有志之士逼上梁山，於他方另起爐灶，締結出獨立、平等、自由的新中國，更偏向「政治小說」，卻列入「社會小說」。吳趼人《新石頭記》、陸士諤《新三國》等「翻新小說」讓舊有人物進入歐風美雨的改革風潮，涉及科學、政治、經濟、教育等，更偏向「理想小說」，卻納入「社會小說」。

「社會小說」的吸納性反映出作爲「拯救中國」的書寫主旨與價值規範，更重於具有想像力的時空形式，滲入強烈的現實關懷與入世精神，導致作爲「他方／未來」的時空形式缺乏經營、鋪陳與轉化，或淪爲一晃子。舉例而言，《黃繡球》、《盧梭魂》承諾的改革後視野，乃是爲凸顯其改革手段的合理性，更著重於通向烏托邦的改革過程，而非改革後的描繪。如此現象亦出現於其他類型，如列入「政治小說」的〈新中國未來記〉於開端之處固然出現屬於時空形式的「未來記」，可是通篇小說的重點卻在兩位角色辯論「中國往後處去」的改革理念與方法，反映出中國最原道的古典情懷——感時憂國，[67] 使得原本更能天馬行空的文學想像（他方／未來）因各種價值理念的競逐而受到壓抑。

由上可見，晚清文藝界雖然尚未拓展出「烏托邦」的次文類，可是不代表其沒有相關作品，反之，普遍出現於其他次文類。透過晚清文藝脈絡的具體爬梳，恰能勾勒出烏托邦視野「發生」的狀況。這些出現於政治、科學、理想、社會等類型的書寫，皆以「拯救中國」作爲主旨，融合各種中西交會的知識思潮與價值內涵，透過他方／未來的形式替中國預約樂觀的遠景。此結合救國主旨、價值思潮與時空形式的書寫，衝擊到文學傳統的理想空間。

66 小說林社，〈謹告小說林社最近之趣意〉，《車中美人》，轉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 1 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173。

67 關於晚清小說反映的「感時憂國」情懷，可見夏志清，〈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愛情．社會．小說》（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4），頁 79-105。

1903 年，羅普（1876-1949）替刊登於《新小說》第 3 號的翻譯小說《海底航行》作批語時指出：「中國理想的小說，如《西遊記》、《鏡花緣》之類，幻造境界卻也不少，只是沒有科學的根柢，其言便無益於世。」[68] 顯然，傳統寄言於「幻境」的書寫如蠻荒異域、虛幻島嶼都因不符晚清的價值理念而被貼上「無益於世」的標籤，遭到排擠剔除。晚清作者群替「幻造境界」注入各種可以拯救中國的價值理念，「他方／未來」的時空中建構出更健全的政治制度、科學文明、社會福利、文化教育或經濟體制等，將傳統無爲逍遙、儉樸歸眞的精神轉變成爲追求國富兵強、文明進步的視野。

五、新小說話語：烏托邦書寫的位置

近一個世紀以來，各種文學史習將「譴責」、「諷刺」小說列爲晚清小說的代表。當然，如此視野自有其文學典律機制的運作，從胡適、魯迅等人對晚清小說的論述，便不難窺見其選擇、品味奠定往後百年小說史的基調。[69] 其中，魯迅提出的「譴責小說」論述，往後更被各文學史放大。[70] 一直到近年，各論者嘗試開拓可能的文學版圖，一再進入晚清的書寫現場，挖掘原始材料，重拼更宏觀的文學圖景。[71] 就此可能的文學圖景，筆者聚焦於具有「烏

68 羅普，〈《海底旅行》第 9 回批語〉，《新小說》3(1903.1): 72。

69 如胡適〈活文學——白話小說〉把晚清小說按地域分爲北方的平話小說、南方的諷刺小說兩類評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則將晚清小說分成「狹邪小說」、「俠義小說及公案」、「譴責小說」三類。見：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最近之五十年》（臺北：文海出版社，2001），頁 15-18；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卷 9，頁 256、269、282。

70 如劉大杰談論晚清小說時主要談及「譴責小說」：「在技巧上講，有些作品還比較粗糙，但那種暴露現實譴責世俗的精神，卻是非常可貴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中華書局，1963，頁 1277）臺靜農亦以譴責小說爲代表：「晚清小說，以譴責小說爲大宗。」（《中國文學史》（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頁 717）。

71 如范伯群，《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0）系統性勾勒出一系列通俗小說的材料；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開拓晚清小說的「新女性」形象；呂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 1849-1908》（臺北：麥田出版社，2009）開拓第一、二代洋場才子的域外行旅與海派都市小說的書寫。

托邦」視野的小說，重探其文學史位置。

魯迅收於《中國小說史略》的〈清末之譴責小說〉一文，逆反晚清梁啓超等人爲提高小說位置而刻意誇張的「小說產生時代」的論調，強調「時代產生小說」，意味著晚清的混亂局勢促成小說書寫的趨向：戊戌變法及義和團事件後，時勢愈加衰頹，「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反映於小說，便是「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72] 魯迅「時代產生小說」的論調，確實可以調整晚清論者對於「小說」功能的無限上綱及「小說」文體過載的現象，不過，仍有其片面性，蓋因晚清的混亂局勢產生比「譴責」更多的書寫可能。從社會發展而言，如《劍橋中國晚清史》所言，「清朝在他的最後的十年中，可能是 1949 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內中國出現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氣的社會。」[73] 從文學發展而言，阿英一早便察及晚清文學的多樣性，指出晚清小說的書寫反映出各種理念，「形形色色，充分的表現了一種過渡期的現象。」[74] 固然，亂世使得小說家「揭發伏藏，顯其弊惡」，可是也寫出「醒齊民之耳目，勵衆庶之心志」的光明面。[75] 因此，當「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譴責小說風靡晚清文壇時，想像烏托邦的小說也席捲而來，犀利悲觀與熱情樂觀的筆鋒，說明「批判」與「讚頌」乃是晚清文人想像時局的兩種大相逕庭的方法。

事實上，我們可輕易於晚清各論述找到極端的「黑暗—光明」的對照，如梁啓超在爲《新小說》介紹「政治小說」的類型時列出自己的寫作計畫，將「敘述不變之中國，寫其將來之慘狀」的〈舊中國未來記〉與「國力之富，冠絕全球」的〈新中國未來記〉作爲對照。[76] 陸士諤則是透過小說《新上海》的敘事者與角色梅伯的一唱一和：

> 梅伯道：「你這《新中國》說得中國怎樣強、怎樣富，人格怎樣高尚，器物怎樣的精良，不是同從前編的什麼《新補天石》一般的用意嗎？」我

7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魯迅全集》第 9 卷，頁 286。

73 費正清、劉廣京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 583。

74 阿英，〈晚清小說的繁榮〉，《晚清小說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 7。

75 衡南劫火仙，〈小說之勢力〉，《清議報》68(1901.1): 1b。

76 新小說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14(1902.8): 無頁碼。

道：「一是糾正其過去，一是希望其未來，這裡頭稍有不同。」[77]

敘事者的回應實是陸士諤的夫子自道，交代自己的各篇小說的用意，爲「糾正其過去」時出現「譴責」之聲，爲「希望其未來」時出現「希望」之聲，「譴責」與「希望」成爲一體兩面的書寫策略。此外，寫《官場現形記》的李伯元亦曾編譯《冰山雪海》的「大同會社」、寫《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吳趼人也寫出《新石頭記》的「文明境界」，可見「譴責」與「希望」乃是一組潛藏的對照結構，說明魯迅筆下的「時勢愈加衰頹」不只會產生譴責小說，亦能激發希望之聲。

接著，筆者欲從「新小說」此一由「小說界革命」號角催生的文體來評估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說的位置。在「改革」的視角下，「新小說」文體不只體現出文學改革，更牽涉到社會政治的改革，如陳建華指出：「（新小說）含有濃厚的烏托邦性質。既擔負起啓蒙『新民』的思想功能，小說就已經成爲『群治』的政治機制的一部分，而這『群治』或『新民』都僅僅存在於梁氏的以西方某種『公民社會』爲藍圖的政治設計中。然而在形式上小說卻成爲『現代性』的一種比喻，眞正顯示了『小說界革命』的內蘊，並爲後來的中國革命與小說實踐所證實：小說的形式猶如社會運動，永遠是開放的、實驗的。」[78] 確實，晚清論者對於「新小說」寄寓了抒發抱負、維新救國的想像，展現新民、群治、現代性、實驗性等功能特質，甚至包羅萬象：「新小說」可「新」「道德、宗教、風俗、學藝、人心、人格」等，[79] 且在「新舊」的對比下確認自身的身分：「舊小說，文學的也；新小說，以文學的而兼科學的。舊小說，常理的也；新小說，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80] 因此在閱讀上「宜作史讀……宜作子讀……宜作志讀」。[81] 時人更參照域外經驗，「歐美小說多係公

77 轉引田若虹，〈陸士諤年譜〉，《陸士諤小說考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頁 292。

78 陳建華，〈新小說與想像社群〉，《讀書》2000.1: 22。

79 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1(1902.11): 1。

80 佚名，〈讀新小說法〉，《新世界小說社報》第 6、7 期 (1907)，轉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 1 卷）1897-1916》，頁 298-299。

81 同上註。

卿碩儒，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賾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82]「西哲有恆言曰：小說者，實學術進步之導火線也，社會文明之發光線也，個人衛生之新空氣也，國家發達之大基礎也。」[83]

以上刊登於《清議報》、《新小說》、《新世界小說社報》與《遊戲世界》的論述只是「小說界革命」論述的冰山一角，不過卻足以反映「新小說」的闡釋框架：從道德、科學、哲理、實學到社會國家，無所不容，折射出晚清文藝界對「新小說」的殷殷期許，逐漸爲「新小說」形塑出一話語體系。以此切入，我們恰可追問：到底哪類小說最能實踐以上「新小說」的期待視野？從「新小說」文體的代表性而言，各小說類型雖可能部分切合，可是未必以此爲依歸，如「狹邪小說」固然反映晚清的社會都市，志不在於「社會文明之發光線也」；「譴責小說」固然批判黑暗世界，未必要「潛推往古，豫揣將來」。相形之下，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更能貼近「新小說」話語，投射出一套相關的內容、訴求與目標，不只要新「道德、宗教、風俗、學藝、人心、人格」，且需「以文學的而兼科學的……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以達到「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賾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的視野，成爲「學術進步之導火線也，社會文明之發光線也」。[84]

我們尚須考量到此類作品的數量、普遍性是否足以支撐起文學史涉及的代表性問題？事實上，此類書寫涉及廣泛的書寫場域，經由不同的報刊物、出版社與作者群形構而成。就刊登具有烏托邦視野的小說刊物而言，便有《新小說》、《月月小說》、《繡像小說》、《小說林》、《砭群叢報》、《新新小說》、《女子世界》、《遊學譯編》、《科學世界》、《俄事警聞》、《民報》、《南方報》、《時報》、《申報》等報刊；出版社則包括改良小說社、湖南苦學社、群學社、上海獨立社、上海啓文社、科學會社、小說林社、新世界小說社、作新社、上海小說進步社等；作者群更不乏晚清文化界主將，如李伯元、吳趼人、陸士諤、梁啓超、陳天華、蔡元培等都屬小說界或政治界大將。此如歐陽健所指出：「晚清的最後十年，曾經被描寫成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然而，正

82 衡南劫火仙，〈小說之勢力〉，《清議報》68(1901.1): 1b。

83 陶祐曾，〈論小說之勢力及其影響〉，《游戲世界》10(1907)，轉引自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 1 卷）1897-1916》，頁 247。

84 參考註 79-83。

是在這一時期裡，醞釀著由黑暗向光明的運動，萌發著對於美好未來的理想憧憬。滿懷激情地嚮往未來，期望中國早日實現民主和富強，……是小說史上值得重視的全新現象。」[85]

於此批作品中，我們可再從內部觀察其書寫的演進路線及代表性作品。其中，發表於 1902 年的〈新中國未來記〉藉由長篇闊論的對話、章程、規則營造出「拯救中國」的方案，以「未來記」彰顯盛況，具有開創性之意義，可是卻非範本，蓋因其因缺少情節敘述、人物刻畫與時空鋪展，較難窺探作爲敘事面的「烏托邦」視野。寫於 1903 年的徐念慈（1875-1908）〈情天債〉、軒轅正裔《瓜分慘禍預言記》亦如〈新中國未來記〉，以夾述夾議的方式道出未來盛世的中國，結構未完整。一直要到 1904 年，晚清小說界出現幾部相對完整且能拓展敘事的烏托邦文本。當中，尤以《繡像小說》著力最深，連載旅生《痴人說夢記》、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與重新翻譯 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 的譯作《回頭看》。《痴人說夢記》道盡人物經歷驚濤駭浪後進入仙人島的歷程，改寫傳統的仙鄉模式，建構出具有現代意義的鎮仙城。《月球殖民地小說》雖爲未完稿，不過卻將烏托邦投射到「世界外世界」的月球，饒具科技意義。《回頭看》則擺脫李提摩太（析津）刊登於 1891 年《萬國公報》的〈回頭看記畧〉的簡略說教版，以新小說文體的敘事面展現更豐富的烏托邦視野。

隨著烏托邦概念的發展，愈來愈多作者透過長篇敘事展現烏托邦視野。1905 年，多種報刊與出版社連載或出版相關作品，如《新小說》連載頤瑣的《黃繡球》、《民報》連載陳天華的《獅子吼》、《南方報》連載吳趼人的《新石頭記》、光緒刊鉛印本的懷仁《盧梭魂》等，透過更完整的小說敘事與結構拓展烏托邦視野。其中，吳趼人刊登於《南方報》的《新石頭記》讓修道幾世的寶玉返回凡塵，漫遊黑暗的上海、天津、武昌後，闖入由道德與科技組成的「文明境界」，目睹千古未有的盛治。作者細緻鋪展「文明境界」，融合傳統與現代的價值內涵，可視爲晚清烏托邦視野的範本。隨後數年，晚清小說界陸續出現一批類似《新石頭記》的書寫，透過「續編」的方式訴說理念，如 1906 年上海啓文社出版的烏程蟄園氏《鄒談一噱》、1907 年新世界小說

85 歐陽健，《晚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頁 225。

社出版的西冷冬青《新水滸》、1909 年上海小說進步社出版的珠溪漁隱《新三國志》及改良小說社出版的陸士諤《新三國》、1910 年改良小說社出版的陸士諤《新水滸》等，以晚清的書寫主旨、價值理念與時空形式，翻新傳統的理想視域。

當然，此類書寫隨著作者群對於「烏托邦」概念的掌控而後出轉精，「烏托邦」甚至成爲小說題名，如 1906 年《月月小說》創刊號刊出的蕭然鬱生〈烏託邦游記〉、1909 年《砭群叢報》刊出的悲盦〈烏託邦之豪傑〉，標誌了「烏托邦」概念的成熟。發展至 1909 與 1910 年，晚清小說作者的烏托邦書寫達到一高峰，許指嚴〈電世界〉與陸士諤的一系列小說如《新野叟曝言》、《新三國》、《新中國》等，以幾近全方位的視角，如政治、科學、工商、教育、文化、社會、史地等，構築美好的中國，比起〈新中國未來記〉已不可同日而語，反映出此書寫的躍進。

六、結　語

在「揭發伏藏，顯其弊惡」的譴責聲中，晚清文化界掀起另一極端的「希望」之音，形塑出近現代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本文基於此，系統性蒐集原始材料，追蹤「烏托邦」譯入晚清文化界、新小說文體以及刊登於文藝刊物的歷程與方式。筆者先透過「概念旅行」的角度指出：作爲新理想空間的表達形式，「烏托邦」此由西方傳入的詞彙與概念在翻譯過程中因被各界介入而呈現不同的面貌，時人從特定的位置替此詞彙注入來自中西脈絡的意涵。「烏托邦」概念之形成並非一蹴而就，經歷連串的表述策略的轉變，從「蓬萊、安樂國」等更偏向隱退封閉的靜態空間的詮釋，發展到可以精確指出詞彙的核心概念、來源與學說內涵，富有政治社會的關懷。經由各種中西概念的挪用與拒斥，交錯／混淆／重疊出一套理想圖像，展現出處於世紀之交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批判與社會期許。

當「烏托邦」此一詞彙與概念進入小說敘事時，更爲作者群發揮想像，構築出一個有別於傳統仙鄉桃源的理想世界。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以中西古今作爲表述的策略，拓展出一套「烏托邦家族」，如烏托邦、黃金世界、大同、極樂世界、華胥國等來自不同脈絡的詞彙與概念，相爲混用，推

陳出新，遙指一個可以逆轉現實困境的新中國，使得理想視域得到（再）創造的契機。不同於仙鄉桃源強調的避世、壽命、安樂等凸顯靜態簡樸、完美自樂的命題，晚清作者群替烏托邦敘事注入政治、冒險、科學等類型，強調主權尊嚴、文明進步等信仰，指涉向經由現代化營造出的完美社會國家。

接著，本文從書寫主旨、時空形式與價值內涵歸納晚清的「烏托邦」視野。從書寫主旨而言，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以「拯救中國」爲主旨，設法替摧枯拉朽的中國指陳出路，因而具有反轉現實的功能；從時空形式而言，這些反轉現實的新理想時空或以「他方」（空間）或以「未來」（時間）作爲跨越現實的方式；從價值內涵而言，晚清的烏托邦視野逸出傳統的無爲逍遙、儉樸歸眞，重製且承載了一個時代有關的世界、科學、哲學、文學等綜合價值。本文進而透過文類角度考察此涉及一個時代的結構性視野於文藝場合中的發生、表述方式，且指出政治、科學、理想、社會小說等次文類對於烏托邦視野的拓展與制約。

最後，本文重新評估晚清烏托邦書寫於文學史的位置。整體而言，晚清小說的「烏托邦」視野更能呼應「新小說」的話語，承擔起「新小說」文體的期待視野——新國家、新民、新道德等功能，蓋因烏托邦視野涉及各種層面的建構，更能貼近「新小說」的要求、特質、功能，理應受到更大的重視。再說，此類書寫由整個文化領域建構，遍布各出版社、報章、期刊與作者群，且發展出屬於其自身脈絡的演進。因而，筆者呼籲此屬於一個時代的結構性書寫理應於文學史版圖佔有更重要的位置，拓展出更多的討論面向，如烏托邦視野的美學內涵、敘事圖像與現代性價值等，重現晚清文學史更豐富的面向。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丁文江、趙豐田　1983　《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月月小說編輯部　1906　〈本社徵文廣告〉，《月月小說》1(1906.11): 無頁碼。

王永建　2000　《「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王孝廉　1982　〈試論中國仙鄉傳說的一些問題〉，《文史學報》12(1982.6): 49-71。

王德威著，宋偉傑譯　2003 〈淆亂的視野——科幻奇談〉，《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社，頁 329-406。

北京圖書館編　1996 《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史有爲　2004 〈外來詞，科學文化的衝擊與再衝擊〉，《外來詞——異文化的使者》，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頁 227-268。

田若虹　2005 〈陸士諤年譜〉，《陸士諤小說考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頁 285-333。

吳趼人　1998 《吳趼人全集》，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

呂文翠　2009 《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 1849-1908》，臺北：麥田出版社。

我佛山人　1908 〈光緒萬年〉，《月月小說》13(1908.2): 1-8。

李豐楙　1996 《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嚴復譯　1931 《原富》，上海：商務印書館。

東海覺我（徐念慈）　1904 〈情天債〉，《女子世界》1(1904.1): 39-48。

金觀濤　1990 〈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二十一世紀》2(1990.12): 17-32。

阿　英　1996 《晚清小說史》，北京：東方出版社。

阿　英　2003 《晚清戲曲小說目》，收入柯靈主編，《阿英全集》第 6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春　颿　1984 《未來世界》，《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社，頁 1-143。

胡　適　2001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最近之五十年》，臺北：文海出版社，頁 15-18。

胡全章　2007 〈晚清小說的主題特徵〉，《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4.4(2007.7): 69-72。

范伯群　2000 《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夏志清　1974 〈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愛情．社會．小說》，臺北：純文學出版社，頁 79-105。

夏曉虹　2001 〈梁啓超與日本明治小說〉，《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頁 53-87。

馬西尼（Federico Masini）　1997 〈十九世紀文獻中的新詞詞表〉，《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上海：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頁 188-274。

馬君武　1903 〈社會主義之鼻祖德麻司摩兒之華嚴界觀〉，《譯書彙編》2.12(1903.3): 109-116。

馬君武　1903 〈社會黨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亞旅行》〉，《政法學報》1(1903.4):

71-81。
商務印書館編印　1913　《重訂商務書館華英字典》，上海：商務印書館。
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著，陳大維、黎思復、黎廷弼譯　1997　《太陽城》，北京：商務印書館。
張惠娟　1986　〈樂園神話與烏托邦〉，《中外文學》15.3(1986.8): 78-100。
梁啓超　1901　〈本館第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100(1901.12): 6。
梁啓超　1902　〈新中國未來記〉，《新小說》1(1902.11): 1-25。
梁啓超　1902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1(1902.11): 1-8。
莫爾（Thomas More）著，戴鎦齡譯　1982　《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
許指嚴　1909　〈電世界〉，《小說時報》1(1909.9): 1。
郭　蓁　1999　〈論晚清政治烏托邦小說〉，《清末小說》22(1999.12): 53-86。
陳天華　1984　《獅子吼》，《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社，頁 1-80。
陳平原　2003　〈中國小說敘事時間的轉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35-61。
陳平原　2005　〈「新小說」類型理論〉，《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64-175。
陳平原、夏曉虹編　1997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 1 卷）1897-191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陳建華　2000　〈新小說與想像社群〉，《讀書》2000.1: 22-25。
陸士諤　1996　《新中國》，《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頁 451-536。
喬．奧．赫茨勒（Joyce Oramel Hertzler）著，張兆麟等譯　1990《烏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悲　盦　1909　〈烏託邦之豪傑〉，《砭群叢報》3(1909.6): 33-39。
悲　盦　1909　〈發凡〉，《砭群叢報》1(1909.5): 9-10。
費正清、劉廣京編　1985　《劍橋中國晚清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黃摩西　1911　《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上海國學扶輪社。
黃錦珠　1995　〈創作活動中小說觀念之轉變〉，《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頁 273-344。
黃錦珠　2005　《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
新小說社　1902　〈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14(1902.8): 無頁碼。
新新小說社　1905　〈新新小說第五期目錄〉，《新新小說》5(1905.2): 目錄頁。

葛兆光　2007 〈晚清對中國傳統資源的重新發現和詮釋〉，《中國思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535-543。

臺靜農　1983 《中國文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碧荷館主人　1984 《黃金世界》，《晚清小說大系》，臺北：廣雅出版社，頁 1-143。

碧荷館主人　1998 《新紀元》，《中國近代孤本小說精本大系》，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頁 457-602。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著，嚴復譯　1971 《天演論》，北京：科學出版社。

劉大杰　1963 《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中華書局。

歐陽健　1997 《晚清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鄭逸梅　1981 《南社叢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魯　迅　1998 《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蕭然鬱生　1906 〈烏託邦游記〉，《月月小說》1(1906.11): 1-12。

衡南劫火仙　1901 〈小說之勢力〉，《清議報》68(1901.1): 1a-1b。

羅　普　1903 〈《海底旅行》第 9 回批語〉，《新小說》3(1903.1): 55-73。

嚴芙孫　1962 〈民國舊派小說名家小史〉，收入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史料部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頁 452-518。

覺　我　1907 〈小說林緣起〉，《小說林》1(1907.2): 1-4。

譯東報　1908 〈新理想國〉，《申報》1908.3.11，第 2 張第 4 版。

蠻　1907 〈小說小話〉，《小說林》1(1907.2): 1-6。

Levitas, Ruth. 1990. *The Concept of Utopia*. London: Philip Allan.

Lobscheid, Wilhelm. 1869.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Hong Kong: Daily Press Office. 日文譯本：羅存德著，井上哲次郎訂增，《增訂英華字典》，東京：藤本次右衛門，1883。

Miller, David. 1987.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aid, Edward W. 1983.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topian Fiction: Structural Writings in Late Qing Literature

Guan Kean-fung*

Abstract

Alongside the voices revealing and condemning social ills present in late Qing fiction, there were also sounds of hope to be heard, which would later shape a Utopian vision in the modern novel. By tracking down and gathering together a large volume of original material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a deceptively thorny issue: just how was it that Utopian concepts and writings came to be present in late Qing cultural circles, New Fiction, and art and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To resolve this question, this study embarks on a conceptual journey, tracing the history of how the term "Utopia" was translated, and discovering the specific ideas and connotations attached to it by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philosophies. This study then adopts a narrative performance perspective to explore how late Qing writers summoned together and further developed a "Utopian family" of concepts in their fictional narratives, such as the Golden World 黃金世界, Great Harmony 大同, Pure Lands 極樂世界, and *Huaxu* 華胥, drawn from a variety of contexts. By further incorporating key themes such as nation-saving, adventure, and science, and emphasizing beliefs in sovereign dignity and civilizing progress, these writers pointed to a distant new China that could reverse the real difficulties the country

* Guan Kean-fu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was in, so restoring creative opportunities to this ideal vision. Third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Utopianism in late Qing fiction by examining the substance of the writings themselves, the forms of space and time employed therein, and their intrinsic value. I then attempt to make sense of the literary context, investigating the ways in which this specifically late Qing era structural vision occurs and is formulated in the literary situation, and indicating how the Utopian vision is reflected in the political, scientific, idealist, and social subgenres of fiction. Finally, the significance of late Qing Utopian writing in literary history is re-evaluated, concluding that Utopian writing, which found its way into various publishing houses, newspapers, periodicals, and writers' groups, was better able to respond to the expectations of a new fictional genre, and so should receive a great deal more attention.

Keywords: Utopia, late Qing, novel, history of literature, New Fiction